

已編索引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第 二 卷 第 七 期

時評

渝陷區貿易入超問題（續）

美國廢止美倭商約（貢）

保甲經費增加（予）

英美對日外交的新變化

中國應採的民族主義

都市與自治

雲南的火把節

湘軍新志（書評）

錢端升

谷春帆

王贛愚

張采人

彭澤益

民二八年八月六日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證第一號新聞紙

時評

滬陷區貿易入超問題

最近海關發表本年上半年全國對外貿易統計，計進口淨值七三〇·六八〇·九九八元，出口淨值四一·四六〇·二二三元，入超之數達三一九·二二五·七五元之鉅。這個數字還是根據法定匯率計算的。如依暗市匯價計算，則入超之數更鉅。

上海英商「金融商業週報」曾將今年頭五個月的貿易數字合成英鎊，再由英鎊依照暗市匯率折合法幣，所得的結果如下。今年一月至五月，全國貿易入超計達二二·八九三·六三七英鎊，約合法幣六八六·八〇九一三四元。平均起來，每月約入超四百六十萬鎊，或一萬四千元。這個數字還沒有包括敵窩在各滬陷口岸走私進口的貨物。此外，敵人在華北各地統制出口貿易，約達總值百分之六十；華中的重要農礦產物被其統制運走的，為數亦鉅。這些出口貨物所產生的外債都不能由我支配。如此一加一減，我國每月對外支付的貿易差額實在太重大了。最近法幣對外匯價一再狂跌，雖與英日談判不無關係，但其最根本的原因實在外匯市場的壓力過大，這是無可諱言的。

我們應當指出，這半年來，多方各關，如蒙自、騰越、溫州、雷州、韶州等，均屬出超。造成目前入超的嚴重形勢的，第一是上海，第二是天津，其次是青島、烟台、廈門等滬陷口岸。進口的貨物均以日貨占第一位。這些地方的海關，政府已失掉統制之權。要想利用貿易管理以減輕入超，已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在這種形勢下，阻止入超的最直接，最有效力的辦法莫過於停止供給滬陷區的進口外匯，只有這樣，才能澈底打擊敵人的經濟侵略，粉碎敵人破壞我國戰時金融的陰謀。希望政府斷然行之。（續）

美國簽約之議，目前即有所聞，而適實現於美關廢止美倭商約此時，最少在道義上予倭寇以莫大的打擊。

這些日來，徵局塞車不開，急待急要，倭寇乘美艦彷徨失措，極力要挾，迫使客忍屈膝，因而在東京談判開始的前夕，成立了所謂「初步協議」，暴日遂大逞其計。詎料暴日心滿意得之際，美國突然宣告廢止商約，乃粉碎其「東亞新秩序」的迷夢。當然，廢約僅是對日報復的開端，而不是對日報復的終點。報復手段不一而足，實施首須下最大的決心。美國主張實施報復者早有人在，參議員畢德門氏即其主要代表。這部分人士屢次提議對日禁運軍需及原料，均受孤立主義派所反對；而政府方面亦始終以此舉與美倭商約抵觸為慮。上月十八日參議員范登堡向參院提出建議，主張政府應廢止美倭商約，其意即在予畢德門禁運提案以通過之機會。這次政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宣告廢止該約，此事實出於一般美人意料之外。但今番廢約在法律上不無根據，因為該約規定簽定國一方得在六個月前宣告廢止。在六個月的過渡時期中，美國雖仍受該約拘束，不過由於國內商人在道義上之受制裁，在輿論上之受指摘，對日輸出軍火原料，勢必有所顧忌，而不敢公然接濟暴日。果爾則暴日在持續戰事的過程中，將受極重大的阻礙，這是毫無疑義的。

美國是維護九國公約最力者，中日戰事開展以來，雖其商人不斷供給倭寇以大宗軍火及原料，然國內普遍的呼籲，仍是反侵略，主正義。此時由報約而開始經濟報復，足證其對遠東的態度更趨積極，更趨具體。今後英國倘肯幡然改圖，與美國共負制裁強暴的責任，到了相當時期，定能使侵略者屈服就範，重建東亞與世界的和平。這並非妄想，却是顯明的道理。

國際的變化，於我們抗戰，有利亦有不利。英國對倭退讓，我們不可因其不利，而沮喪失望；同時美國對倭廢約，我們又不可因其有利，而僥倖苟安。在困苦艱難的環境中，祇要我們能自信，能自立，能自助，以抗敵到底

的決心，取得民族的生存。（責）

保甲經費增加

近日軍政部為便利役政推行計，通令各省切實整頓保甲，實事頗值我們注目。

在地方制下，保甲與役政關係，至為密切；前者不健全，而後者弊端遂生。惟茲抗戰期間，推行保甲應備重實際效用，自衛為先，自治次之。依此原則，而整頓保甲，其應注意之點，為戶口編查務求正確，保甲長人選務求適當，保甲規約務求切合實際。凡此諸端，無疑的是十分重要，但依我們看來，保甲經費充足，實為一切改革之先決條件。

保甲經費支綱或不確定，實為數年來推行保甲的最大困難。以往各地保甲經費，大致趨重攤派，以無薪給之保甲長，而予以撫派之權，勸索敲詐，

滋擾學政，勢所難免。本年二月間行政院會計有鑒於此，曾通過「非常時期保甲長待遇及獎勵辦法」，明定「保甲長辦公費，因各縣政府斟酌地方財力，及社會生活狀況，規定標準，列入預算，統籌發給，不得由保甲長自行籌派」。從此保甲經費遂由攤派而改為統籌，不啻為改善保甲的主要步驟。目前不少省縣，初議統籌，縱有許多困難，但時勢所趨，也不得不切按個別實況，多方研討籌措路徑，不但要使經費有著，還且要使經費充裕。其辦法雖未必應求一致，然其標準却應求增高。財力是一切事業之母，經費來源確定，各地保甲定可順利進行，役政亦賴以臻於完善。這是抗戰中應注意的一項要務。（予）

英美對日外交的新變化

英美人民對於中日戰爭的態度，自戰事開始以來，一向是漸漸地親中國。想中國，敬服中國，遠日本，抑日本，憎惡日本。這種左右袒的趨勢是一貫的，雖則十分緩進，却是久而久之，其進步也很可觀。若就英美兩國的人民比較，英國因為在遠東利益要大些，被日本嘲諷也要大些，所以其人民助華抑日的趨勢也大些。

英美為民治國家，就理論上講，其政府的政策也應反映人民的態度。大體上，這種反映也確是事實。不過，因為政制的不同與當局者目光的不同，這反映不一定是完全準確。美國總統與國會對立，所以其中如有一個機關被孤立派主所把持，則另一個也無單獨反映輿論的可能。英國當局者狃於妥協的成見，所以人民極可厭棄妥協政策，而政府仍可戀戀於這個政策而不捨。因此，我們在估計英美兩國對中日戰爭的政策的可能的變化時，除了兩國的輿論外，尚須同時顧到兩國的政制及領袖人物的目光。

這次英日東京談判中，英國的屈服，可以代表英政府目光之短，而並非

由於英國人民對中日態度有所變更。此所以不特反對黨人反對，而政府黨報紙亦一再抱歉，並希望已公佈的議定書須作狹義的解釋。此所以不特在英的英人反對，而在華的英商也表示惋惜與失望與反對。

英政府的行為，眼看起來，固應使我們失望，並且因為有賣友的嫌疑，使得我們憤慨。但仔細研究一下，則到現在為止，英日雙方七月二十四日所發表的英日議定書，其對於英國的損害，實無止十倍百倍於對我的損害。英國近年在國際上地位之所以陷落，全因其畏縮不前，不遵重條約義務，任令侵略國撕毀條約，其結果則害及英國本國的利益。自九一八日本破壞國聯盟約侵略中國以至今，希特勒撕毀張伯倫賣友而製成的慕尼黑協定，英國一直能非，方欲糾正國際觀念。然知痛改科正未竟全功，國際誠信未孚，而突又有此賣友的東京妥協，將多年來英國贊同美國不承認主義的表示，國聯屢次責難日本侵略的譴決，以及九國公約，關聯貿易，非戰公約等等，一概抹殺。

· 謂日敵作友人，與中國等量齊觀，不分青紅皂白。這樣一來，試問誰復能相信英國有反侵略的決心？誰復願幫助英國禦德。英政府固可以「反侵略集團」尚未組成，美蘇尚在袖手旁觀之時，英國不能更開罪於日本」自辯，然而如果英國可與侵略者日本妥協，則他縱真想抵抗另一侵略者希特勒，又烏能具有任何意義，所以這種妥協如果不毅然終止，則張伯倫領導下的英國最後非向希特勒整個屈服不可。

反過來，英日妥協對我的損害，除了一時精神上的打擊外，是不能太大的。我們是決心抗戰，不至日寇退出中國不止的國家。我們的決心已博得英人好我惡日的趨勢仍會日增月累，即使張伯倫能安於其位，最終亦不能不順從民意而對日取堅決的態度。

而且因為英人的反對與美國對日政策及行動的硬化，英日間的初步協定也決不能有任何具體的重要結果。如果東京談判能依妥協的精神順利進行，當然更會有許多具體的讓步及不利於我的實際犧牲。但是這決非情勢所能許。日寇極可提出許多苛刻條件，但英政府為維持其本國的人心及美國的聯絡，大體上決難承認。故其勢必亟於決裂。七月二十七日及二十八日兩日經見，大體上決難承認。故其勢必亟於決裂。七月二十七日及二十八日兩日的正式談判已因日方要求的蠻橫，而發生種種困難。英方已有一部分人要求放棄談判，而日方則又在騷動所謂反英運動。

關於應付日下東京談判的方法，我們以為除應加緊抗戰以增英人同情外，我們更可憑藉這個同情，而對英政府提明確的要求。第一，英政府在有田克萊琪議定書之下談判天津（或整個中日）問題是對我不友誼的行動，我們應使英政府知悉（Note）此點。第二，七月二十四日以來張伯倫與哈里法克斯既聲言不變對華政策，我們應要求英政府即速有一具體的表示，如借款之類，以證實此不變。第三，日本報紙既登載日方將有撤換卡爾大使的要求，謂我方報紙不妨向我政府作同樣諷示，如果日方真有此種要求，而英政府視然受之，不如痛駁，則我方亦可正式提出謂撫克萊琪的要求。我們有權利令

別先後提出這幾點。張伯倫政府既可違反英國民意而陷我於不利，則我們僅可適應英國民意，而對張伯倫政府提出一些嚴重的要求。我們應認清英政府此次的行動是違反民意的，不能有任何結果的，所以我們不但消極方面不應悲觀，而且積極方面，應有所動作，以增加英國人民對於張伯倫的壓迫，並以增加英國民意貢獻政治的機會。

如果英政府的行動因為無民意為基礎而不會有若何結果，也不會有若何長期的影響，則美政府此次通知廢除美日商約之舉，正因其能適應民意，而將發生重大效果，且將為美國對日政策較大變化的開路者。

美國民衆本日極憎惡日本，美國政府領袖更有幫助華抑日，徒以盡政府行動處處受國會牽制，而國會的孤立派又動輒能利用人民厭戰的心理，對於政府各種有積極性的建議，權施阻撓。美國人民咸知日本軍火及作戰原料大都取自美國，但為免除露骨的左右袒，苦無阻止之方。國會領袖畢德門等人早欲在立法上有所改正，庶幾政府得限制對日貿易，以減小日本的經濟支持力。但如限制對日貿易，則孤立派認為違反中立，認為將有引起美日衝突的危險。如不加限制，則日本長可利用美貨以作侵略行動。畢德門等歷久未敢提出抑制日本的法案者即以此故。七月十二日畢德門故大膽子，提出一案，授權總統禁止破壞九國公約的國家在美購軍火軍需。但這個議案又與現行美日商約中的最惠國待遇條款若有衝突。蓋依照一九一一年二月的美日商約，兩國應各以最惠國待遇予對方。如果畢德門案通過，則日方將不能如其他國家同樣在美購買軍火軍需。雖云法律與條約有同一效力，新法律可以改變舊條約，但美國既以遵守條約責他國，則自己自然須站於絕對遵守條約的立場上。因此美參院督請國務部研究畢德門案是否與美日商約衝突的問題。在國務部未置復前，共和黨參院領袖范登堡已提出請總統通知廢約的議案。一九一一年條約本規定有效期十年，如不作廢續續有效，但十年以後，兩方可隨時通知廢約，通知後六個月後，則停止有效，如條約一廢，則畢德門案或 other 貿易上歧視日本的辦法，當然美國政府可以自由運用。七月二十六日，

總統鑒於英國有繼續軟化的可能，乃不待范登堡案的通過，即毅然根據憲法賦予的權限，突然通知日方，擬將商約廢止。

這次的廢約，爲的完全是欲使禁售軍火軍需的辦法不抵觸條約，而不是條約的本身有若何破綻。商約於明年一月二十六日作廢後，美政府應有以經濟制裁日本的可能，所以廢約的舉動，不但在道義上大壯我們之胆，在實質上，半年而後，美國也確可加速日本的經濟崩潰。不過美國孤立派的勢仍不可厚侮，廢約雖可視為美政府採取制日行動的開始，但制日行動，是否即可

中國應採的民族主義

谷春帆

如其人類只有兩種生活標準，兩種道德觀念，不是和平，即是戰爭，不是理性的論辯，即是單國的獨裁，不是優游放浪的雅典式生活，即是馬肆營壘的司巴達生活，不是文明，即是野蠻，不是瘋狂的民族主義，即是無恥的頑民主義，不入於楊，即入於墨，則誠難其選。

但中國要向那裏走，不是任何一個兩個中國人所能選，亦無待其選，歷史所昭示的趨勢，無非即是全民族所選的趨勢。

一百年來，中國受抑鬱憤怒的民族情緒所支配，這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度最大的力量，任何人不能忽視。中國人已經受了一百年的羞辱，誰要再在中華民族頭上增加羞辱者，不論他是中國人外國人，是親是仇，亦不論他抱具何種見解，何種作用，亦不論其所言所行是何種道德觀念，何種論理哲學，亦不論其主張在長時期內對中華民族有利與無利，他決不爲中華民族大衆所容忍。

中國人素向是和平主義者。孫中山先生以和平奮鬥救中國昭示後人，廿七年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宣言，亦以爲抗日戰爭是爲東亞和平，爲世界和平的抗戰。並「鄭重聲明吾人之本願在和平吾人之最終希望仍在和平」這種說法，以戰爭爲達到和平之手段，並不是宣傳，並不是曲解，而是中國人心限

一帆風順，當然仍有問題。我們所希望者，即全美人民能知日本是泥鴆，而不怕日本敢有所報復。

至於英美兩國的平行政策是否因此次東京談判的初步妥協與美之通知廢約，而可以加緊或放弛，則也須看張伯倫之是否可教。如果可教，他自然應當步武羅斯福的後塵，向日本進逼，逼至他不能緊張侵略爲止。如果不可以教，則英國固不敢進逼，連美國也將有不斷的顧慮，而不敢邁步前進。因此我們更需要向張伯倫提出些明顯而合理的要求，以促其猛省。

中實：如此感覺的說法，中國人渴愛和平，只在砲火硝煙一些的地方，人民即刻會恢復和平秩序的生活。中國人的抗戰是「應戰」。只爲驗察和平秩序的生活，被日寇所威脅所破壞之故，才不得不起而自衛。自衛有感？自衛其和平秩序之生活。因此在中國人說來，民族羞恥的報復，與和平生活的維持，同樣可貴。一是內心的和平。一爲物質的和平。是整個和平社會的和平。爲維持物質關係的和平而屈服降順，增加民族羞恥與怨毒，本著對中國人心中不是和平完滿的生活，而是不和平的生活。同樣，爲了擊潰與民族怨毒，而永久維持敵愾戰備的民族主義，使日常和平雍容的生活方式，變成仇敵怨恨的人生關係，亦必是普通中國人所不樂意的生活。中國人由於舊習中庸。現代中國即是要在兩極端中找個中道。要在極端的民族主義新野蠻主義，與極端的文化生活和平退隱生活中間，尋個中道。要使民族的光榮，與生活和平，得個調和，得個平衡。

這個調和與平衡，當然不是輕易所能安排妥帖的。而安排調和的責任，不能不望之於先知先覺的知識份子與爲國家支持爲民意先驅的中層階級。任何國家中，上層貴族階級占極少數，而且往往是墮落的或私利的。下層勞動階級雖占最多數，而不識不知，無政治勢力，往往不能左右政治。中層知識

階級是時代潮流羣衆趨勢的占候。因此我對於中國的智識階級與中層階級不釋不致春秋責備賢者之意。

中國智識份子中層階級民族意識之發生最早，民族情緒亦最熱。自九一八以來，智識份子與社會輿論，時時刻刻以屈服妥協賣國政府，以抵抗作戰，推動政府。因此之故，燃着了抗戰的火燄，推動了抗戰的輪轉。但事勢與機會，均不會容許我們將抗日戰爭的民族主義，預先深刻傳布到民衆中間去，預先有充分的組織。使抗戰不得不以早熟的形態出現，使初期的抗戰備嘗許多不必要的損失與痛苦。使許多中華兒女會得心理上毫無準備而去做頑民做漢奸。中層智識階級非但沒有將民衆宣傳好組織好，並且自己也沒有準備好，智識階級本身，即是意見最紛歧最無團結的雜湊。我們有了民族主義空頭的熱情與勇氣，而沒有得到民族主義的技術與方式，更沒有得到民族主義的紀律與服從。在民族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頭，最需要智識份子中層階級，深謀遠慮，從民族國家千年的立場，作後起後覺百萬羣衆的指針。在這最需要理智考慮的時候，而我們知識份子，竟拋棄理智，逃避民族羞恥憤怒的指示，在五六年前，即要發動早熟的抗戰，不能不說其幼稚與不負責。

與熱情幼稚相對的，我們更不得不致痛於智識份子中層階級敗北主義之多。大小漢奸，十之八九屬於智識份子中層階級，國家平日屬望之中堅份子。中華民族雖願和平，却不甘於百年羞辱之上，輕輕再加降服的羞辱。抗戰雖為政府決定之大計，而實有多數人的民族情緒民族恥辱為其後盾。何以許多一向具有革命政治經驗之人，亦會得盲目於羣衆的民族情緒，違反着百年來推進中國史的原動力民族怨恨而主張敗北，誠不可解。

介與敗北與幼稚之間，則為旁皇迷惑的知識份子。許多人責備中國智識階級，在抗戰期間最不緊張，最不夠節氣。只是放任於游閑消極度日歲月的生活。這是事實。這種責備也是對的。但智識階級，何以最不緊張，最不夠民族主義，就因為智識階級是文化的結晶，是理智的總彙。換句話說，就是抗拒民族主義狂流的最後壁壘。在他們，理智的涵養，生活的優裕，成為智識的墮落生活。如六朝人之清談，明末人之風流，使整個文化腐化舉步，決

慎的隨性。在他們，非但民族怨恨，成爲問題。民族國家的本身，成爲問題。民治自由，與獨裁政制，成爲問題。抗戰的終極目的，與民生的和平建設，成爲問題。人類對於橫暴侵凌的抗拒是正義道德的觀念，而在他們，則非但正義道德，成爲問題，甚至知識觀察的本身，均成爲問題。抗戰是熱情的衝動，是道德的驅策，在道德標準本身成爲疑問的智識份子中，在熱情衝動要以理智考慮辯難的智識份子中，抗戰之不能緊張，不是智識份子之不盡職，而是智識份子之迷於靈驗。因為他們是生來作爲「非戰」的資料的。此輩智識份子既不能發動勇氣，參加抗戰，而同時又不能感到民族恥辱的刺激，與偉大時代的潮流。因之他們理智文化的最後壁壘，處處有搖動之虞。他們爲了素養，不能慷慨參加抗戰。他們爲了時代，不能積極主張非戰。他們放棄了民族的責任，同時放棄了知識階級的責任。他們不能了解自衛抗戰的民族主義與瘋狂侵略的民族主義之不同。而在惶惑徘徊中生活在慘痛無聊生，激流中的微物。

中國人之民族怨毒，已積百年，難以一洩而盡。無論勝敗如何。民族恥辱之怨毒，必因抗戰之慘酷而增長。民族光榮之觀念，亦必因抗戰之成就而增長。世界軍備之競爭，敵人耽視之戒備，均不可忽。故民族主義之在中國，將更加增長，不無疑義。以後百年之中國歷史，將更受民族主義之支配，但中國人因向來和平散漫雍容之故，其民族主義，定另有新的變化，而不能爲德意式之瘋狂侵略的民族主義。如何使新興民族主義與向來和平主義，謀一妥帖調和處置之方，而成爲中國式的民族主義合理的民族主義，尤爲以後百年來中國史上之大問題。中國的智識階級，如不能有意識地提出一個，中國的民衆必然會被歷史所指示而做出一個來。

和平主義之植根在於農業社會。將來之中國工業化為必不可少之趨勢。故和平散漫之生活方式多少必改變消弱。農業社會的和平文化，變成優游奔忙的墮落生活。如六朝人之清談，明末人之風流，使整個文化腐化舉步，決

不能與將來工業文化及世界大勢適應。和平文化的生活，中國人所優爲，亦必須維持。但只能以不妨碍合理的民族精神的發展與團結爲條件。反過來，瘋狂式的民族主義，中國人向來領受不下，而爲了抵抗強暴，維持生存，却又必須要有相當程度的民族主義，或其代替物。如其瘋狂的民族主義與文化生活，有可以調和並存之處，則以中國人之好中庸，雖可以在半民族主義與半文化生活中間，覓一平衡。但現代式的瘋狂民族主義，與和平文化，決不容並存。實行民族主義，則增其反理智尚武力的政策，必然要破壞社會上優秀開雅的生活。而且必然要擾亂此種文化生活背後平和安閑的心境。要維持此種心境與生活，則必不能使其搆旗拿串跑龍套，爲不可知不可信不可捉摸之民族至上主義，而打架，而棒場，而吶喊，而拼命。兩者根本不相容，故中道折半之主義不能行。

如民族主義可以不用素養，可於一日一夜間造成，則中國可繼續其優游文物之生活，在外患臨頭時，一號召而得十足之民族主義信徒。如人類之信仰行爲習慣如此善變，毫無挂礙，則中國之前途，自無問題。無如浸潤於文化生活之人，雖敵兵臨城，尚不忘臨寺講經。雖戰書星急，尚不忘後庭低唱。民族主義之敗壞民氣，要平時不斷的刺激與訓練，決不能臨時湊數。如此則中國前途之民族主義，又如何而可與其向來之和平文化相並存？

近代瘋狂的民族主義建築於民族間之仇恨與怨毒。此仇恨怨毒之心，決不能與和平文化之心理並存。但抗強暴，禦侵凌，求生存，必定須存此怨毒之心。現代國家是階級國家，是一階級統治他階級之國家，故強敵侵凌時，不能以國家之利益召羣衆作殊死之奮鬥，而不得不在民族主義之招牌下，以同族同文同種同血統同歷史同生活等種種情感之刺激，作爲號召之資料。但同文同種等說法，實本無同利益可言。民族主義下之敵愾鬥志，不得不盡情感的，主觀的，直覺的刺激而不任理智的冷酷的分析。因而民族至上主義不能與文化生活的理智至上主義相調和。但代表人類實質利益分野的最高機構，不是民族，而是國家。在階級社會以內，國家利益與階級利益不相

符合，故不能激起人與國家間利害相關的一點點。因而只有統治階級能將自身與國家同化，多數被統治人不能與國家同化。但在無階級或階級分化不甚著明（如中國）而真民治的國家，國家與人民，必然成爲一體，彼此之間休戚相關，如一家一樣，在這種國家中，我想如有抵抗強暴發動戰爭的必要，儘可以不訴之於怨恨仇毒的野蠻民族主義，而訴之於利益互助的自衛生存觀念。而且可不用國家的伸訴，人民自然會得爲保衛生存而發動敵愾。這一理想，在抗日戰爭中，非但已經實行，並且已兼具了中國式民族主義之根基。

中國民族主義，尙無深切根基，不容諱言。但在自衛抗戰之過程中，最勇敢犧牲的，不是統治份子與民族主義之呼號者，而是不識不知勞動羣衆的士兵。他們不是爲了民族光榮，不是爲了國家利益，（他們未必知道這些）而是爲了自己家庭鄉里生存之威脅，自己同胞親愛友好之人生命之喪失，爲了自己直感的憤怒，爲了復仇。這種直接利益的申訴，其發動民衆，還勝於民族主義的宣傳。要使人民爲了直接利益而戰，平時不需要對敵人怨毒憤怒的刺激，而只需要對同胞仁愛互助的陶養。平時愈有親愛互助的社會觀念，事急愈能共赴國難而發生國家觀念。他們是爲了自助助他而抗戰，不是爲了民族光榮而抗戰。理性自由與民治，非但不與這種新的民族主義相反，而且新興的民族主義，更需要自由理性與民治。因爲只有完全討論明白一個問題的利害，使理性得到完善的主宰，方才能明白自助助他的利益，方才明白個人利益與人羣利益的分野，方才不受敵人的分化而能够精神團結。

何以中國勞動羣衆在抗戰中最勇敢？其理由很明顯。馬克斯主義者，雖以國家爲階級統治的工具，但同族內，因爲歷史語言習俗文化之相同，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往往互忘而認爲一致，且同樣受道德輿論的制裁，一切均成爲道德律與法制的規律活動。統治與被統治，不以兩個相對的階級出現，而以在道德天理下，一羣和諧的人羣出現。其利害成爲一致。即在統治階級無道，被統治階級困窮的時候，對異族的天然嫌隙，亦往往使被統治階級，因

爲體性及恐懼的關係，專顧奮力保存自己民族的統治。同民族的熱愛，如禽獸同類之愛，是天然的本能衝動。在異民族侵略時，可以不用理智考慮，而作本能的抵抗。即使本族的統治十分無道，而侵略的異族，在戰爭的仇恨與威脅下進來統治，可以預料其必然更爲無道。這種常識的預料，屢屢爲歷史所證明。

在階級國家遭逢暴力侵略時，尙能發動民族間自然利益之一致。則無階級分野真正民治的國家，如其遭逢強力侵略其必能更加發動深切的民衆益利之共鳴，使民衆不獨爲了國家集團的利益而奮鬥，而實實爲了自己生存享樂而奮鬥可以無疑。這樣的奮鬥，不用近代瘋狂的民族主義之感情的衝動，也不用近代獨裁政制之反民主反理性反自由的愚民政策。民衆對於自己的集團，知其真正感覺到利害一致生死與共之處，則在平時愈是慶弔相通休戚相關，在戰時愈是同仇敵愾。自衛生存是人類天然的本能。不是近代民族主義所包圍的新發明。法蘭西人最崇拜自由，亦最能愛國且爲國家而犧牲，同時亦是最浸潤于文化生活的人民。可知愛國情緒不必與瘋狂的民族主義發生連係，亦不必與文化生活相鑿枘。如國家的利益與民衆的利益一致則人民爲自衛生存計，必然愛護其集團之國家。在平時人民之與國家，和平相處，如魚之忘於水。在戰時人民之樂衛國家樂就國家亦必如魚之就於水。因爲國家是人民所共有，亦爲人民所共愛。愛國家即是愛自己。在這種國家裏，和與戰是纔可以公開討無，用理智辯難的問題，而不是用感情直覺處置的問題。政府的力量，是建築在人民的力量上。建築在人民真自身的利益上，而不在籠統抽象的民族觀念上。民族自衛的精神與理性可以並存不悖，而且愈是經得起理性的討論，民族精神亦愈爲發皇。中國以自衛抗戰，發動民族精神，其民族精神與自衛生存，互相維繫。此爲中國式民族主義之特點，與德意俄羅斯的軍國式民族主義不同。中國式的民族主義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民族主義，是合理的民族主義。「對國家盡至忠，對民族行大孝，因仁愛而有同仇敵愾之氣，因信義而有一致赴難之團結，因和平而抵抗暴力」。自衛抗戰，已

奠定中國式民族主義之基礎。隨抗戰之進展，而此種民族主義必日壯。

中國的農業社會，必然要改革。因爲農業社會的階級性與其社會關係的隨性，不適於這種無階級的民主國家。西洋十九世紀式的工業社會與民主政治，亦不能無條件適用。因爲他同樣的不適於一個無階級的民主國家。我堅決相信工業化是中國唯一的出路。因爲要使民衆團結組織，要使教育普及，要使平時有豐裕的生活，戰時有豐裕的資源均有賴於工業化。但我並不相信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式的民治制度，一定是工業化的條件。其詳細理由，當在別處說。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是近代瘋狂的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導師。現代所謂民主國家雖然對於獨裁國家，表面上似乎處在敵對地位。而根本上只是一邱之貉。是「有」與「無」的爭執，而不是民主與獨裁的爭執。資本主義之必然趨於世界分割，必然趨於帝國主義，必然趨於戰爭，因之必然發生近代瘋狂民族主義，是事實與理論兩面證實的東西，雖然所謂民治國家的民衆，多數趨向非戰，如美國人之主張孤立，英國工黨之反對徵兵。然而近代國家，即在所謂民治國內，亦免不了成爲政治家與其代表利益的孤注，收捨而戰爭時，民衆無論其利害關係如何，不得不做聯繫的犧牲品。只有在真正無階級的民治國家內，民衆方能爲了自己的利益而有主張。也只有工業化而出以社會性的建設，才能趨向於無階級的真正民治的國家。也只有這樣國家，才能平時建設和平樂觀的文化，戰時號召慷慨效命的民衆，才能平時謀民衆生活程度之提高，而戰時有可以動員的物質基礎，——軍備與資源。而且不以平時的和平，消磨緊急時的自衛力量。亦不以緊急時的自衛措置，妨礙平時和平文化的生活與心境。這是中國文明與民族主義的中庸大道。在最近的將來，中國矯枉過正，不得不向民族主義方面走，以矯正其因循敷衍之暮氣。而在最後的終局，則中國與世界，均不得不在民族主義與文化生活間謀一中道。否則民族主義之狂熱，固將舉歡食人，文化生活之墮落，亦將使人類消滅。此不獨爲中國問題，亦爲世界問題。

都市與自治

王贊愚

民治應從地方自治出發，已為國人所共認；但促進地方自治應從鄉村入手，國應從都市開始，在論壇上迄仍爭辯不休。本刊近來有過幾篇這類的文字；我個人對此問題會加思慮，現在也來參加討論。

許多人以為我們本是農業國家，工業尚在萌芽時代，社會的核心是鄉村，而不是都市，所以地方自治應從鄉村開始。這種議論似是而實非，我個人不敢贊同。我不是說從鄉村推行自治，絕對不可能；却是說從都市推行自治，比較容易有效果，我也未嘗否認在中國境內幾乎到處是鄉村，說得上都市的實在甚少。即就這一點上說，我們似應該主張地方自治從鄉村開始，逐漸再求推廣，須知任何社會試驗，在開始的時期，不妨由小處狹處做起，雖然最要緊的是着眼要大。促進地方自治也是一樣。我們不要把自治看太容易，太簡單了，却要首先認識自治本身的要求是什麼，然後向最高的目標，作累積的努力，一步一步擴充自治的範圍。

過去八九年來，我國倡辦地方自治者，上自政府當局，下至民間輿論，好像都誤解了地方自治的本質，把它當做一蹴可成的政治事業。欲使自治「短期完成」，不知政府當局頒佈了多少法規；不知地方民衆增加了多少負擔；又不知籌辦人員白費了多少功夫。無疑地，以往我們政府對地方自治的規劃，大致偏重於縣自治，尤其是鄉村自治，祇求形勢上的普及，莫管實施上

規命令上說，在我國確已燦然大備；以自治組織論，他國較之似亦有遜色。向來文化經濟俱為落後的中國，要在整整幾年之內，成了一個自治最發達的現代國家，誰都知道其為不可能。

我們對地方自治闖了這些年，結果未見其利，祇觀其弊。農民負擔因而倍增了，土劣操權因而加厲了，地方要政因而忽略了，下級黨政糾紛因而頻繁了，於是人民厭惡自治，視為迂腐；而負責人員亦因循敷衍，奉行故事。至今檢討已往成績，不值識者一笑。概刮的說，在全國一千九百餘縣中，始終沒有一縣做到縣長民選；自各省以及縣市，參議會的正式成立，亦始終未成事實。雖然許多縣市中「區分所」均會先後產生，但沒有一地達到區長民選的程度。直到二十三年「改進地方自治原則」頒佈以後，各地「區分所」改組，「坊公所」撤銷，而鄉鎮村公所成為僅存的碩果。在這種組織以內，半因財力薄弱，半因人才欠缺，地方自治不能有所表現。總之，從此以後，中央當局指導各地自治，簡直漫無方針，進退失據；而各地方又因遵令提前舉辦保甲，勢難兼顧自治了。要不因為去年「抗戰建國綱領」上提醒了幾句，地方自治恐早就告結束了。

在今後建國的過程中，地方自治仍應為一大目標。考其過去失敗之由，我們倘不改易途逕，再度嘗試又是難逃慘敗。人們常不了解歐洲人民不惜流血以爭自治，而中國人在政府領導之下，為何反不願積極籌辦自治？推究其故，便知自治生活不能與中國社會經濟的實際相適應，又與其傳統的「無爲」哲學相脫節。我國本是一大農業社會，在它境內大半是鄉村，生產手段向來是分散的，各人各家自營生活，互不依賴。這類社會實際上不需要團體的活動，人民雖時常往來，然始終不能結合而成互助社會。硬要劃鄉分壤，

集會選舉，使其生活自散漫進於組織，由消極趨於積極，終久必無成功之理。以往民間雖偶有自治團體產生，但其性質大抵係官治的變態，其組織亦往往以倫理情誼相維繫，究與現代地方自治制度相異其趣。反之，在歐西先進國家，地方自治的發榮滋長，是在工業革命以後。工商業發達，人口逐漸集中，都市因而蓬勃而起。都市是人民相需相求的政治結合，其中居民雖似各不相關，但其日常生活，自始含有互助的精神。因為人口驟增，五方雜處，社會關係更形複雜，許多切身的需要，非市民各依己力所能供給，勢非借助政府不可。由此以觀，市民對政府舉措的關懷，較諸鄉民必為殷切，故其政治的興趣較深厚，團體的能力亦較強大。在歐西，地方自治是「都市文明」的產物，各國都市因生產方法的進步，把人聯合起來；市民尋常生活互相連繫，而團體自治的需要，乃自然發生了。

從經驗上說，地方自治不單需要精神條件，還需要物質條件。要使人民出其餘力以營公務，必須經濟富足，生活安定；要使人民運用民權，參與政事，又必須教育普及，交通便利。在一般都市裏，自治乃是最要求，也有好結果，不外因為許多物質條件，俱備無缺，社會公共精神和連帶意識，遂因之容易培養。

自治從鄉村開始，障礙不一而足。其中經濟問題，要算是最嚴重。姑就中國而言，大多數農民均在死亡線上掙扎，衣食時虞無着，何堪重稅苛捐。「竭力」盡經費而不可得，自治遂成具文。縱能於窮鄉僻壤，搜集些許金錢，也往往無濟於事。擔負愈重，農民愈困，生活生機亦愈微。經濟困難以外，農民教育程度，也成大問題。鄉民愚昧懦弱，強使其過著自治生活，強使其養成參政能力，實在難乎又難。人民有養，然後有教，兩者俱備，自能明是非，識大體，對於政治權有了準備，纔有了距離。雖然有些人到鄉村去，想從民衆教育做起，用意未嘗不好，但倘依然漠視地方的經濟條件，結果也無益於自治之推行。其次，現代自治事務，日趨繁複，其借助技術人才的需要，亦日亟急切；鄉村人才上譜，鄉村較諸都市，也難免瞠乎其後。鄉村無人

才，強要自治，時勢所演，祇有替土劣造機會，助淫威，虐苦人民，欺胥地方，是意中事。

要促成地方自治，而不選擇適宜環境，是曲恭減裂；以往我們從鄉村試行自治，即患了如此大弊病。我個人認為地方自治在中國並不是無法推行；不過為避免失敗計，必須以都市為實施的起點。近年來，中央當局所籌劃的自治制度，如果勞頭專就都市試行，多半沒有重大困難；但偏要由鄉村開始，強使鄉下人開其端倪，則往往望洋難行。地方自治是政治上的一大試驗，其成敗靠人者半，靠環境者亦半。都市以人口的稠密，交通的便利，工商業一天天發達，教育一天天普及，所以人力財力以及團體觀念，必定比鄉村為優。在這些條件上，兩相比較，我們不能不承認在都市中開始自治為最易行，並且最有效的。

證諸各國經驗，都市中之政治生活，無不為鄉村之模範。自工業革命後，都市相繼崛起，形成各國經濟重心，由其把握金融的脈絡，由其控制交易的樞紐。置重心於都市，以都市統轄鄉村，姑不問其是否健全的發展，早成了莫可隨遇之趨勢。都市在經濟上是如此，其在政治上也何嘗不是如此？在歐美歷史上，民主政治即由都市發端，隨著工業化的進展，都市蓬勃而生，民治範圍漸以擴充。人們常說民治是以工業社會為基礎，這話在大體上是有根據的。工商業發達之後，都市中資產階級，欲發展其企業，保持其財權，毅然決然出來過問政治，乃有所謂都市自治運動。但同時又因想為國家保持統一，讓許多都市在國家法令支配之下，享有特殊權利，得以自由處理其範圍內之地方事務。歐西各國促進自治，雖從都市入手，然始終沒有忽略了鄉村，不過實際鄉村僅佔次要的被動的地位而已。

說起地方自治，往往漫無邊際。中國幅員為世界最遼闊，促進自治自應先創單位。省失之過大，區失之過小，故自十七年後，中央定「縣」為自治單位，立法原意未嘗不善。殊不知縣區大致是鄉村，幾佔全國面積之極大部分。在這樣廣大的範圍內試行自治，加以物質條件缺乏，其失敗乃意料所及

「市」是較自然的自治單位，在我國境內仍是寥寥無幾，共計僅有五六個的「院轄市」（直轄於行政院的市）和十幾個的「省轄市」（直轄於省府的市）。以人口論，這些市只佔全國百分之三，遠不及歐美各國。如果我們的自治，不從那些「縣」起始，祇從這些「市」出發；不強求極多數的鄉民練習自治，祇鼓勵較少數的市民參與政事，將自治放在狹小範圍內嘗試，然後再求向外推廣，我們敢相信經過一個短時期準備，全國民治規模，由此得以樹立。從縣或鄉村開始自治，顯然是民治的錯誤發端。今後我們倘不易調蹊徑，地方自治再辦幾年，結果必又遭失敗。

中國今日，正在工業革命的初期，鄉村太多，而都市太少，乃是實情。雖然都市在我國古代便已有了，但為數極為有限。我國舊日都市，恆隨政治變遷而盛衰，且歷代傳習，重農輕商，而交易中心又為國人所不重視。都市不從早建設，交通致遲滯不進，工商業亦莫由發達。直至海通以後，沿海商埠，因中外人士接濟經營，而形成新式的都市，其於我國政治經濟的進展，實予以莫大的刺激。十七年國府定都南京後，更感建設都市的重要，而於沿江一帶先後設立許多都市。在六年訓政時期，「市自治」照理應該率先推進，從早完成；但截至現在為止，國內幾無一市完成其政治的使命。說起來也頗可惜！

現在我們祇有「市組織法」的頒佈，還沒有「市自治法」的成立，自治

權限未加確定，實為都市發展的梗塞。自二十三年「改進地方自治原則」公佈以後，在市方面，區公所改組，坊公所撤銷，已根本看不到什麼自治組織了。依照原定程序，市參議會的設立，應與區長民選同時舉行。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中央順應民意，通告各市先期設立參議會，詎料或因環境不許，或因籌辦不及，直至抗戰的前夕，始終未見產生。至在「院轄市」方面，北平市雖最先設立參議會，但不久因為內部糾紛疊起，終致陷於停頓；上海市會有所謂「臨時參議會」成立，惟其性質却與民意機關迥然不同。策動全國政治的各大都市，既已如此，何能更奢望於各縣和鄉村呢？

中國的工業化，仍在萌芽時期；都市建設的條件，尙未具備。我們以後的數十年，倘肯向工業化大路上奔馳，終久會達到更深刻的都市化。須知現代都市是工業化的產物，又是日漸擴大的有機體。與往昔的都市相異，在各國歷史上，以宗教、政治及教育為推動力，雖能使都市興起，但不能使都市發達。因為三者吸收人口的能力，必然有其限度。所以現代大都市的產生，大致要推因於工商業的發達。十九世紀以前的都市，人口尙屬不多，其驟急的增加要算在於工業革命之後。都市以人口的無限增加，勢必一日千里。

在促進工業化的過程中，我們建設都市，一面固應注意經濟的，一面又須重視政治目標。向民治大路上走去，從都市推行自治，乃其最穩當的起點。本此原則，以建立中國的新政治秩序，此外我們似乎沒有其他途徑了。

雲南的火把節

張采人

我們最近在昆明會屢次看到盛大的火炬游行，萬千民眾排成長蛇陣，拿着明亮的火炬，呼喊着各種有關抗建的口號，很興奮的結隊前進，這當然是種很有意義的羣衆運動。

其實在雲南，這種火炬的集會，已有很悠久的歷史。每逢舊曆六月廿五

熱鬧的情景，這一天叫作「大把節」又叫作「星回節」。這種節日似乎是雲南特有的，有地方性和歷史性的。

關於這個「火把節」的盛況，清初滇中名醫陳天麟，有一首詩記載道，題目作「六月廿四夜觀點火炬」。下面抄的是那首詩：

驕燈市市元宵節，爆竹家家除夕風。惟有商人極作炬，每於是夜大嘗

紅。咸陽三月光華勝，赤壁千艘焰照同。我獨欵寥供羈坐，願將故事話興亡。

在這首詩裏，陸天麟把火炬節的情景，比作咸陽三月赤壁千艘，可見其熱烈。現在陰曆六月廿五日，就要到來，陸天麟當時據說這故事，我們不妨將關於這個故事的傳說，就記憶所及的，列舉幾件，以供關心雲南風土歷史者的參考。

第一種是政治方面的傳說，楊慎說的相當具體。楊慎撰載記云：

皮羅閣之立，當玄宗開元十六年，受唐冊封爲雲南王賜名歸義。於是南詔更强大，而五詔微弱。皮羅閣因仲夏二十五日祭先之期，建松明爲樓，以會五詔。宴醉後，羅閣佯下樓，擊鼓舉火焚樓，五詔遂滅。○開羅賜劍南節度使，求合五詔合一，朝廷許之。於是盡有雲南之地。

這是雲南歷史很重要的一頁，因爲南詔將其他五詔併吞爲一，在當時政治上當然是一個很大的變動，關於南詔怎樣謀殺五詔酋長的情形，諸葛元聲所著的「漢史」，曾有極詳細的記載，而且指出了這是火把節的起源。茲再將「漢史」所述南詔如何謀殺五詔的一節，錄之如下：

乃於國中，預設一樓，極其華麗；樓上空設錦繡，其中之戶牖板櫺，悉用松明，每舉宴會，即與臣下登此樓飲酒盡歡。至是年六月二十五日，正值祭先之期，令人招聚五詔遺酋，同來助祭。諸國聞命，不敢不來。至期祭畢，舉宴，延衆登樓，飲皆盡歡。須臾皮羅閣佯醉下樓，擊鼓，發火焚樓，各詔之首領，盡成燐燄，南詔不復有遺患矣。國人始悟樓木用松明之意。漢俗於是夕點火滿衢巷，名曰星回節，當亦紀勝相沿成俗云。

由上面所記看來，火把節好像是慶賀六詔統一的紀念日。諸葛亮征南有關係的，清初師荔房所著「漢書」云：

火把節，即星回節。六月廿五日，農民持炬照耀田間以新年，通省皆然。其說有三：一，武侯征南，於是日燃蒿蕪，侵夜入城，城中父老

設庭燎以迎之。

照此說來，火把節的起源，好像又是當時民衆爲諸葛亮所特開的歡迎大會。這是關於軍事方面的傳說了。

另外還有兩說都是關於社會方面的傳說，而且事涉愛情，極爲哀艷，同見於「清獻」。

一、曼阿奴之妻阿南。時阿奴爲漢將郭某所殺，欲妻之，阿南恐避已。

詔之曰，妾欲從君，君能從我三事乎？曰從，曰，一須作幕次，焚故夫；二須焚故夫衣，三須令國人遍知禮嫁。明日如其言，聚國人張帷幕，置火其下。阿南抽刀出，令火熾盛，乃焚夫衣告曰，妾忍以身事仇乎，身躍火中以刀自斷。時六月二十五日也，國人哀之，歲以是日笑炬聚會以弔之。

一、鄧駿詔慈善。開元中，南詔於星回節，召五詔燕會。慈善遂知其謀，止夫無往。夫不可，乃作鐵劙約其臂而去。既而南詔果焚五詔，佯以醉失火，焚死各詔，骸骨無從辨認，獨慈善與尸而去。南詔聞其音，欲娶之，慈善閉城自固，發兵圍之，三月食盡，乃罄衣裝，西向自縛於座，竟以餓死。臨卒曰，吾往訴夫冤於上帝。南詔聞之悔曰，懊惱此貞節婦，乃旌其城曰德源城。

以上兩說，都是表彰貞烈，可認爲社會方面的關係。阿南的事，「漢書」中另有一條，說她的男人是酋長曼阿奴，爲漢將郭世忠所殺。慈善的事，「漢史」中亦有記載，而且很詳，這件事，就是南詔以計焚殺其餘五詔一件事裏所附帶發生的。

火把節故事的傳說，就個人記憶所看到的材料，大致是上面所舉的四種。究竟那一種傳說可靠，還有待於詳細的考證。就常理推測，當以六詔統一的關係，比較近理。因爲這是當時雲南政治上的一個大變動。至於諸葛亮擒孟獲，當然也是那時一件驚人的大事，然而似乎是局部性質，不像六詔統一，是那時雲南全省都受影響的一個「奇迭打」。至於表彰貞烈，只是社會上

的事件，比起六詔統一與武侯征南，自是更渺小了。這種事據常理推測，是不會產生如此壯偉紀念場面的節日的。

此外昆明倪蛻翁所著的「滇小記」，述各地擺夷人風俗，謂在鎮南者，也是有的，當前雖說近於宗教儀式，原起或為一種歷史題目，亦未可知。如此看來，其在雲南流傳之廣更可以想見了。

大把節這種祭會，至今雲南各地，每逢舊曆六月廿五日的晚上，還在熱

湘軍新志（書評）

彭澤益

在抗戰期間，羅爾綱先生寫成了這本湘軍新志（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叢刊，民國二十八年五月商務初版），對湘軍重新作了一番評價，這是很值得我們欣慰和注意的。

全書分十三章。第一章敘述湘軍沒有創立前緣及其制度的種種積弊與崩潰原因；第二章敘述湘軍怎樣應運而生和成立的經過，以及戰紀等等；第三章敘述湘軍的領袖和將士的思想與故鄉，這對於湘軍全部的了解，是最關鍵的一點；第四章敘述湘軍制度的淵源，並有兩點辨正：（一）關於曾國藩謂團練擬採「近人傳肅成法」一點；（二）王定安湘軍記謂「湘軍規制，多採之王蟲練勇芻言」之說；第五章敘述湘軍營制，並就制度本身有所評論；第六章敘述湘軍餉章和餉源；第七章敘述湘軍是怎樣招募和遣散的，及其間相互的影響；第八章敘述湘軍的紀律；第九章敘述湘軍的訓練，怎樣使之收穫致果之效。（第八章紀律最好歸併第九章訓練中敘述，因為軍隊訓練含義有二：一方面是紀律，他方面是戰鬥），第十章敘述湘軍人才與軍功的選拔；第十一章敘述湘軍的戰術，如何削平了太平軍之亂；第十二章敘述湘軍攻下了金陵，曾國藩為什麼要力主解散；第十三章敘述湘軍制度的影響。全書內容大致如上所述。湘軍雖已成為歷史上的陳跡，然而牠的歷史意義，我們不可忽視。研究軍事學的人大都很重視這本書，即使當日湘軍的戰爭不能與今日等量齊觀，但湘軍的訓練和戰術的一般原則，還有可供今日參考的地方。比如湘軍的基本戰術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這一點即是紮營時講求構築堅固的工事，拔營時嚴防敵人的突擊，作戰時慎重的偵察地形，

爭取主動的地位，予敵人致命的打擊！現今陸軍作戰，在原則上仍然是這麼一套辦法。尤其會國藩平生最服膺的「結硬寨，打死仗」這一戰術，不就是一九三〇—三三年江西所用的「碉堡政策」嗎？

羅爾綱先生在戰時提出湘軍作重新的估價，必然要引起我們非常的注意。

第一，湘軍起初本來是一種「勇」的組織，當時所謂團練，今日則稱之為組訓民衆。現在抗戰時期，各省各地有民衆抗日自衛軍團的組織，這與當時湘軍的創立在原則上是無二致的，也可說我們是因襲成法。不過有一點很值得我們研究，就是最初只有一千零八人的湘軍，如何發展成為十二萬人的大軍，成為太平軍的勁敵，成為挽救垂危清室的一支生力軍呢！目前我們正從事艱苦的抗戰建國運動，這一點大可供我們的參考。我們應如何將已發動或未動員的民衆通通嚴密編組起來，成為鐵的隊伍，驅逐日寇出中國！我想這種力量一定會大過湘軍的！

第二，道光末年，滿清政府吃了幾次敗仗，賠了很多的款，財政奇絀。但清廷為求自存，不得不千方百計籌措軍餉，負擔十餘萬湘軍的給養。（見王闡運湘軍志籌餉篇）現在長期抗戰的過程中，中央財政困難，未減清室。但是為爭取最後勝利，必須堅持抗戰到底！目前的整軍建軍運動，是抗戰致勝最後的一著。這一任務的完成，當然需要大宗的軍費，（但是我們不希望我們的政府「興厘金」，「征雜稅」，增加人民的負擔）在這一方面，滿清政府為籌軍費支撑抗戰的努力，却不無可供借鏡之處。

第三，任何一種革命運動，總得有羣衆做它的基礎。如果先去了民衆的

烈的舉行着。究竟怎樣一個來源，我們所知道的，略如上述。深望本省香宿，以及研究本省風土歷史的先生們，能給我們一個詳明的考證。

我們看到了昆明市最近的火炬游行，偉大的場面實在令人感動，想起了雲南省向來早有的火把節，性質雖不盡同，給人刺激却差不多是一樣的。所以把他提出來，供大家討論。同時并希望吾國抗戰，不久得到最後勝利，那時再舉行一個最偉大最熱烈的火把節，來慶祝中華民族的新生。

掩護，這一革命是沒有成功的可能。中國一九二五—二七的北伐，便是最明顯的例子。它的成功，完全由於民衆，不論在間接或直接方面的貢獻。古語說，「得道者多助」，就是這樁道理。湘軍出師討伐太平軍時，的確很能得到當日士大夫和一般民衆的同情。（關於太平天國與湘軍的批評，暫保留不談：）湘軍在這方面的成就，應完全歸功于有嚴格的訓練，和嚴明的風紀。曾國藩所撰的愛民語中有云：「在家皆是做良民，出來當兵也是人」。這兩句話全是針對着軍人的最大惡習而言。兵愛百姓，百姓才肯幫助兵隊的一切，這是一貫的道理。現在我們的抗戰，首先必須軍民合作，然後才能做到「軍愛民，民愛軍，軍民合作打敵人」（現時的一條抗敵標語）這一地步。凡此，這點尤其值得我們學習。

第四，湘軍的一般領袖人物的政治道德，也是很值得我們取法的。湘軍在本質上是私人軍隊，然而他們對於公私分辨得非常清楚，決不以私害公，

這種精神，雖「百世之下，猶可以想見」。（頁四十一）當時曾國藩很受朝廷和同僚（如塔齊布等曾國藩破壞綠營制度）的忌嫉和不滿，但他那種忠於「君父」的精神，終於使人釋去猜忌。當塔齊布和曾國藩發生磨擦的時候，曾國藩爲了顧全大局，不得不慨嘆的對他的幕客說道：「時事日亟，臣子既不能弭大亂，何敢以己事瀆君父，吾寧避之耳。」（頁三十二）若是他的政治修養不够，恐彼此早兵戎相見了。可是到了後世，一談武人政客就不同了。

我們在今天讀湘軍新志的「序」，這點意思是應該把握着的，不要把牠看得太「史」的了。

作者在本書中更指出了湘軍制度的影響。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湘軍制度流弊所及，演成了民元以後軍閥割據的形態。本來湘軍最大的特色在使「兵爲將有」，當湘軍解散，淮軍代之而起，淮軍在興起的時候，就已成爲私人的軍隊。（見曾文正公書札卷二十五復李宮保）直到李鴻章死後，大權完全落在袁世凱的手中。（武昌起義，袁世凱遂得因勢乘便以遂其私。民國初，袁氏盜國，再起革命。及袁氏既死，北平軍閥遂演分崩割據之局）。（頁一四四）因此在近代史上如果論北洋軍閥勢力的興起和以後循環不息的軍閥爭的混戰，當以湘軍對綠營制度的改革爲罪惡的淵藪。所以作者很慨然的說道：

「我們論史的人，推源這幾十年來的禍亂，實以湘軍制度使兵爲將有以

種其基，其將帥得據督撫的地位，以行其權勢而促成。故禍亂雖不見于湘軍盛行，而其禍源則實由於其制度所造成，固昭然具在，斑斑可考的。」（頁二四五）

此外還有一點影響也是值得一提的。今日湖南人在革命歷史上的紀錄最高，民族戰士和革命青年的輩出，不論在某一種革命的場合之中，總少不了湖南人的參加。Nym Wales 在 *Lives of Revolution* 一書中就論到這點；她說湖南人是革命種，這是很對的。在當時三湘人士多樂於從軍勇敢善戰，胡林翼說這是由於湘軍幾個將領開的風氣。這種尚武精神影響於後世，一直發展到今天，便成爲奮勇不撓的革命精神。豈止如胡林翼所說只影響於當日呢！湘軍新志用很講究美觀的語言寫成，羅先生在這方面的努力顯然可見。他對湘軍作很公正的評價，另一方面幫助我們了解太平天國的一處山頭目一。

本期撰者

谷春帆先生論中國民族主義的長文共分四次登出，此次結束了這長文。谷先生說明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潛在已久，在此次抗戰中始得揚眉吐氣；他相信中國人的民族主義不特應避免瘋狂式的民族主義，而且事實上也一定走上合乎理性的民族主義。這是值得國人深長思一個大問題。

張采人先生服務於昆明某大銀行，是一位留心滇省風俗掌故者。彭澤益先生在中山大學研究歷史，他所作書評對於湘軍有不少意見。

今日評論 每星期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 今日評論社

昆明青雲街一六九號

印 刷 名 中 央 日 報 社
總 經 售 正中書局雜誌推廣所

昆明鳳翥街一號

分 售 全 國 各 書 局

價 目 零售五分訂閱全年二元半年一元

中國銀行

◎ 竭誠爲社會服務 ◎

◎ 努力謀顧客便利 ◎

本行爲國民政府特許之國際匯兌銀行資本四千萬元全國各地有分支行國外紐約倫敦星加坡巴達維亞
仰光河內海防大坂等分行其他各國有代理處辦理國內外匯兌各種存款放款及其他一切銀行業務手續
簡捷服務週到如蒙光顧毋任歡迎

中國實業銀行

爲教育文化界服務

最誠摯的 · 是

本銀行成立於民國八年以輔助金融發展實業爲宗旨
國內各大商埠及繁盛區域均設有分支行及辦事處資
本總額四百萬元辦理各種存款放款匯兌及一切銀行
業務兼營儲蓄及信託會計獨立各種儲蓄及信託存款

訂有詳章手續簡便

金城銀行

上海總行 江西路

昆明行址 金碧路



利用下列各航線 載客 運郵 輸貨

1 昆明——重慶——西安

每星期三五由昆明開

2 昆明——成都——漢中——西安轉往——蘭州

每夏——西寧——涼州

每星期四由昆明開

3 昆明——河內——轉往——香港

每星期三五由昆明開

4 昆明——重慶——桂林——轉往——香港

每期無定期

歐亞航空公司

昆明 崑明街三號